

## ■ 名流影像

他在北宋初年参与儒家群经的校订和注疏，是首屈一指的经学大儒。但他亦爱慕权位，攀附权奸，受到当时和后世非议。

学术涵养与为官之道的背道而驰，留给后世诸多指摘之处，让人扼腕叹息。

## 邢昺：经学大儒不免俗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  
本报通讯员 郭登奎

历史人物的形象，犹如一枚包裹严密的洋葱。只有层层地抽丝剥茧，才能在汗牛充栋的史籍中探究到真实面目的蛛丝马迹。

北宋初年的经学大儒邢昺(bǐng)，便是明显的例证。他学术成就冠绝当时，可个人品行却屡遭非议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其著作《论语注疏》作评说：“汉学、宋学兹其转关。”承认了他在经学体系中“承上启下”的关键地位。可全面了解这位经学大儒，又会发觉端正严肃的儒者形象下，隐藏着恋官、慕权、爱财等“不免俗”的常人形象。

如今在邢昺的故乡曹县，知晓的人少之又少，了解的人更微乎其微。

## “九经及第”老进士

邢昺年近半百步入仕途，在短时间内脱颖而出，除了超群绝伦的个人能力外，也往往和政治大气候息息相关。

邢昺赶上了儒者的好时代。北宋初年的太祖、太宗，萦绕心间的大事，首先是统一南北、结束割据，其次是兴复文教、昌盛儒学。以统一促文教，以儒学化天下，两者相辅相成，互为倚重。

邢昺的青春岁月，史书记载较少之又少。他字叔明，生于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（公元932年）的曹州济阴（今曹县西北）。当时天下混乱无序，地方藐视中央，甚至有狂言“天子宁有种耶？兵强马壮者为之矣”的节度使。

北宋学者欧阳修著《新五代史》时，每每以“呜呼”开首，哀叹礼乐崩坏纲常道绝，先王制度文章扫地。“五代之乱极矣……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，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。”邢昺见惯了“朝为天子，暮为亡魂”的动乱变故。

一直到公元960年，赵匡胤建宋，混乱的局面才告终结，此年邢昺29岁。赵匡胤建宋后，重视纲常伦理振兴、儒家思想重建。在这种大背景下，儒学渊博、精通经学的邢昺年近半百方才入仕，却屡获超迁，屡得重用。

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（公元977年），46岁的邢昺赴都城汴京参加《五经》科目考试。廷试当日，宋太宗令他讲解《周易》中《师》和《比》两个卦象。《师》为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第七卦，主旨为宣明战争乃王者治国平天下事。《比》紧随《师》卦后，为《周易》第八卦，讲解国家外交事宜。当时，北宋在为削平割据和收复幽云十六州谋划，太宗选題颇有针对性，希冀选拔合适的人才。

邢昺依据广博知识储备，有的放矢娓娓道来，深得太宗赏识。接着太宗从群经寻題发问，邢昺皆对答如流，极为得体。太宗嘉奖他渊博，破格擢升为“九经及第”，授大理评事，参与疑案的审理，后任职泰州盐城监，负责当地盐业管理，赐钱二十万嘉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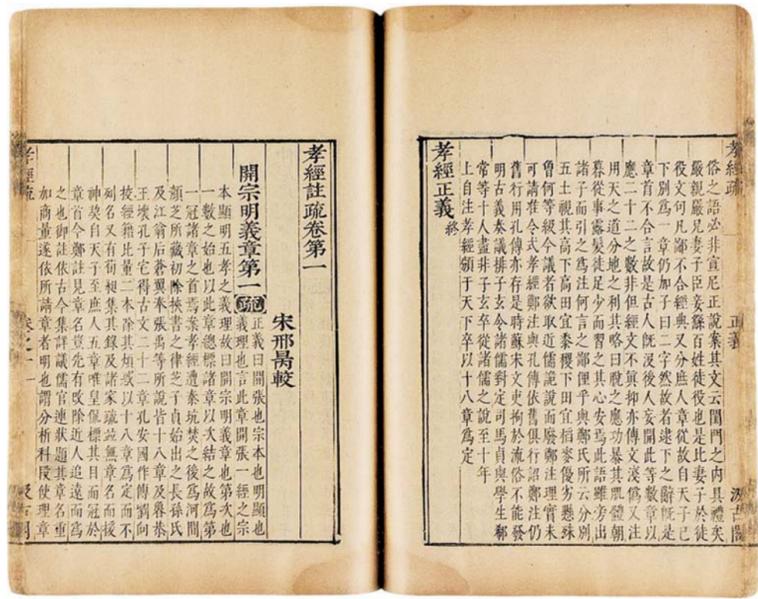
年近五旬方入仕，邢昺的起点比旁人低许多。也许是深知年龄的劣势，邢昺起初办事兢兢业业，经常将心得感悟呈递朝廷。他在泰州掌管盐业不久，便发现盐城监虽隶属泰州管理，却地处楚州和泰州间，盐业掣肘颇多。邢昺经过研究，认为楚州交通便利，泰州位置偏僻。关系国计民生的盐业，理应隶属交通通达的楚州方能进出无虞。所以他立刻上疏，建议将盐城监变更隶属，朝廷也同意了他的意见。

第二年，太宗想起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老进士，他将邢昺调回京师，任国子监丞。

在国子监任上，邢昺得展所长，如鱼得水，渊博的儒学素养得到朝廷众臣的认可。

## 精于学而疏于政

因为文教成绩突出，太宗赐邢昺红色官



邢昺的《孝经注疏》



邢昺注疏的《论语注疏》

服，调其为诸王府侍讲。在东官及内廷，邢昺为帝王和皇子讲述《孝经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书》《易》《诗》《左传》等儒家经典，解答他们围绕经学提出的各种问题。与其他儒生训诂考据的学者不同，这位老先生善于从儒家典籍文字中发散出“义理”，而这也正是他后来能领导群臣修订经籍的关键。

太宗雍熙年间，邢昺选撰《礼选》二十卷献于帝王。太宗看到其中有《文王世子》篇，便询问侍臣王昭敏：“邢昺为诸王讲说，如何提及这篇文章啊？”昭敏答道：“诸王向邢昺访求文章义理所在，邢昺每次都发明君臣父子之道，于诸王面前反复陈说。”太宗闻后甚喜。

邢昺这种于文字中见义理的讲解，深受皇帝和诸皇子的赞赏。太宗曾询问邢昺：“管仲、召忽都是齐国公子纠的师傅。后来齐桓公在国君争夺战中胜出，召忽为君主而死，管仲却归顺任相国。召忽以忠诚死，管仲不能守臣节，为臣之道难不成这样吗？”邢昺便引用历史其他典故和当下形势予以说明阐释，获得太宗褒奖。而在《礼记·世子篇》中，东汉末年大儒郑玄作注说：“周文王因为勤奋忧虑而折损阳寿，周武王却以安逸享乐而延年益寿。”太宗对此又表示质疑，“朕以为《礼记》本意必非如此。夏禹焦虑烦劳，虞舜赐给他美玉雕琢的玄圭，最终享国高寿。如果周文王有忧人之心，不放松闲暇，纵使没有天人感应，也不至于亏损寿命吧。”邢昺再次阐发道理，用历史典故来对答。

太宗关注儒家经典，并不在字义精微，而是重义理之道。邢昺解经教授，也不局限于字句疏解，已初具宋学端倪。

邢昺虽精于讲学，对政事仍极为挂念。这也是邢昺后半生的矛盾写照，既娴熟儒学，又醉心仕途，总是在学与仕之间摇摆不定。

雍熙年间，邢昺抓住机遇，利用他人举荐任水部员外郎，后又转任金部郎中，掌管天下库藏出纳、权衡度量。但在两职上，邢昺没有多少政绩可言。而邢昺精于儒学的特质，却为他所教授的学生之一——寿王即后来成为真宗的赵恒所服膺。

赵恒即位前，便对儒学恩师钦佩有加，即位后予以重任。此时邢昺已66岁，却被委任为审刑院长官，负责核查大理寺案件。审刑院事关国家法制建设，对大理寺的案件有复核权，地位远高于大理寺与刑部。邢昺任职不久，真宗就发现恩师才学不在刑律，便又命刘元吉共同主持事务。

虽有入帮辅，邢昺仍如盲人摸象，工作举步维艰。当年冬天，百般无奈的邢昺只得上疏请求去职，希望继续从事讲读讽谏的工作。真宗将他任右谏议大夫这个闲职寄禄官，只任职而不任事。

此时邢昺年近古稀，又从实职岗位调离，仕途一片黯淡。但与46岁举九经及第相仿，宋朝对文治的重视，让邢昺仕途反而步入快车道。

咸平二年（公元999年），宋真宗于朝廷设置翰林侍讲学士，邢昺任此职。更幸运的是，邢昺立刻参与规模宏大的儒家经典校订和注疏工作，也因此留名千古。

## 古稀老人校群经

随着北宋经济社会复兴，经籍图书数量增加。宋初太祖太宗两朝，朝廷掌握图书数量少得可怜。太祖时只有一万多卷，其后削平地方割据，收图书文字，又下诏购散亡，国家所藏之书，才稍有增益。太宗于左升龙门北修建藏文院，把国家掌握的书籍充实进去，还另建“秘阁”，藏书一万多卷。至真宗朝，随着镂版印刷发明推广，流通图书开始大量增加。国家图书从一万多卷，骤增至十多万卷。

真宗曾前往国子监阅书，咨询邢昺图书收藏情况。邢昺答曰：“国初不及四千卷，今已有藏书十余万卷，经、传、正史皆已具备。我年少求学时，经籍有注疏的往往百无一二。如今镂版印刷大兴，平常人家都有藏书，这真是儒者遇到好时代。”邢昺此语虽有阿谀之嫌，却也道出了当时经籍繁荣的事实。

图书数量暴涨，带来了质量的参差不齐。为统一思想，校勘群经的工作势在必行。咸平二年，真宗令68岁的邢昺总领校勘事。各经籍经邢昺等人校勘后再雕刻颁行，谬误比唐以前靠传抄的图书大为减少，这对儒学流布有重大意义。

邢昺不仅负责校勘，还亲自撰写了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尔雅》三经的正义。

邢昺对经学的最显著贡献，是其在“汉学”和“宋学”转化中的关键地位。经学分两类：一类是偏重训诂考证的“汉学”，一类是偏重义理诠释的“宋学”。五代时，动乱的社会严重冲击了“汉学”的独尊地位。在北宋初年的学者看来，“汉学”对于弘扬道德人心、重建思想体系裨益无多。北宋初年古文学家柳开就对汉唐经师“不明理道”深感不满，一直抱有重新注解儒家五经、复兴儒学的愿景。他常说：“吾他日终悉别为注解矣。”

柳开念念不忘的宏愿，最终在邢昺的努力下实现。虽然邢昺自幼学习汉唐经书，具有浓重的守旧色彩，但他已开始关注义理，对汉唐经学有所发彩改造。

邢昺的经学思想，主要倾注于他负责注疏的几篇儒家经典中。邢昺所撰写的《论语正义》《孝经正义》和《尔雅义疏》，至今收录于《十三经注疏》中，作为经籍的经典注疏。

《论语正义》以曹魏何晏集解为主。邢昺以南朝梁皇侃《论语义疏》为底本，博采诸儒之说判定。《孝经正义》以唐玄宗御注为主，邢昺取元行冲的疏本约而修之。《尔雅义疏》则以西晋郭璞注为主，但邢昺认为后世注解浅陋不足据，别为疏释。

邢昺作注疏后，朝廷立于学官，作为士子研习标准。《四库全书》将邢昺《论语正义》收入时，曾写有一段评语：“今观其书，大抵鄙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，汉学宋学，兹其转关……”邢昺详于名物训诂，但也“稍傅以义理”。以义理说经，正是宋学的最大特点。邢昺之后，宋学逐步蔚为大气候。但考镜源流，其光大与邢昺的经学整理不无关系。

邢昺经学实开宋学义理说经先河，在经学史上具有承前继后的转关地位。

## 结交权奸惹非议

经籍注疏修纂完成后，真宗大悦，升邢昺为淮南、两浙巡抚使，考察两地吏治得失。不久邢昺又回到中央担任讲读职。对于邢昺这样的功臣老臣，真宗格外敬重。他于崇政殿宴请近臣，就特地赏赐邢昺裘衣、金带，加器甲等物品，还升任邢昺为工部侍郎，兼国子祭酒。

随着官职提升和年龄增长，邢昺对权位的贪婪开始严重起来。邢昺能够打破年龄限制，屡获重任，除了学识渊博之外，和真宗朝权臣王钦若的良好关系也是其中关键。

在《宋史》中，修史者只在邢昺本传最末，委婉道出了二人之间的暧昧关系。

咸平年间，王钦若主持科考考试，录用了名为任懿的考生。后来有人上告，任懿是凭借贿赂王钦若得以中第。真宗把案事下达御史台处理。御史台经过审理，认为任懿的确有向王钦若行贿的嫌疑。

身为副宰相——参知政事的王钦若为自保再次上诉，真宗下诏由邢昺领衔，会同大臣边肃、毋宾古、阎承翰在太常寺重审。任懿不知何故突然翻供，说自己造访过时任考官洪湛。

自己的贿银托付给旁人交纳后，并不知最后送入谁手中。邢昺等人趁机诬陷洪湛，说其接受贿银，帮助任懿作弊，力证王钦若无罪。当时洪湛出使陕西，回朝时官司已经定案，他虽受冤却百口莫辩。最终在邢昺主持下，洪湛被坐罪削籍，流放儋州，后客死异乡，而王钦若无罪开释。

事实上当洪湛代替王钦若入考场时，任懿已考到第三场，根本没有机会行贿。后来官府在查抄洪湛赃物时，也没有发现任懿贿赂的赃银证据。此案影响甚广，许多朝臣明知洪湛代人蒙冤，却因惧怕王钦若的权势而不敢言直。

邢昺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，无疑让身处险境的王钦若铭记在心。一旦他官复原职，便大力提拔恩人。他除了不断举荐邢昺外，还破格让邢昺贪财无能的儿子邢仲宝任三司判官。

邢昺在古稀之年能加官进爵，恩宠不减，很大程度缘于王钦若的举荐。

枉法权奸王钦若，给邢昺的形象造成致命打击，成为一生不能抹去的污点。《宋史》说“昺之厚被宠顾，钦若与有功焉”，语带婉转有为尊者讳的遮掩。但后世评论却没有顾及邢昺的形象，对他个人品行无情鞭挞。例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虽对邢昺著作有较为客观的评价，但对个人品性却称为“金邪”。

在宋百岁富翁所著笔记《枫窗小牍》中，还记录了一则揭露邢昺品行的轶事。其大意为“邢昺以九经及第起身，却郁郁结仅作一无用儒者，就倾心结交了权臣王钦若。因为和奸臣同流合污，所以为清流浅薄。他奉命校撰《尔雅疏义》，在太学生中引发极大的非议。太学生邹盛扬言：‘昔人不分辨老子与韩非的区别，今人同样共传《尔雅》的郭璞注和邢昺疏……郭璞因忤逆东晋叛臣王敦被杀，邢昺却因阿附王钦若显荣，《尔雅》郭注近乎刚正，而邢昺却走向奸邪。’邹盛不仅到处传说，更向朝廷建议取消邢昺疏解。当时邢昺为经学大儒，常自称北魏大才子邢邵后人。邢邵为北朝贤相，为人热忱，生活简朴，屡受赞誉。因此邢昺相：‘景纯（郭璞字）有孙，子才（邢邵字）无后。’”

## 爱官恋权不免俗

邢昺在世时，并未受流言影响，一直受真宗的尊敬和厚爱。而他也利用这层特殊关系谋求了许多看似不应该的利益。

邢昺每次与真宗言谈，常常不自觉地谈及从前一起共事却过世的旧僚。每当谈及这些人，邢昺都会哀叹唯有自己还留存世上。真宗也会感慨唏嘘，愈发珍惜这位年过七旬的白发老人。

景德二年（公元1005年），73岁的邢昺上奏真宗：“我故去的哥哥曾考中过进士，希望他能够享受恩典荣耀。”真宗尽量满足要求，追赠邢昺兄为大理评事。

不久，真宗又赐邢昺白金千两，还将昺妻传至宫廷，赏给冠帽珍贵衣物。景德四年（公元1007年），邢昺表示自己年迈羸老，趋步上朝困难，希望能休一年回到故乡看望乡民，等到明年郊祀再还朝。真宗动了怜悯之心，不断用温言好话慰劳他。为打消邢昺后顾之忧，真宗说：“爱卿可临时担任曹州知州，何须休假？”见到皇帝慷慨，邢昺又提出从前旧臣杨砺、夏侯峤和自己同为府僚，两人去世后都追赠了尚书职位。

言者有心，听者无意。直到第二天，真宗才从邢昺的话中品出点滋味来。他对宰相说：“这句话能看出邢昺的心志啊。”就任命邢昺为工部尚书、知曹州、职如故。

辞别回乡当日，真宗又赐邢昺裘衣、金带，以示优宠。为表达对邢昺的尊重，真宗特意打开龙图阁，召近臣在崇和殿设宴，亲自作五、七言诗二首赐予邢昺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（公元1008年），真宗到泰山封禅，邢昺上表曹州民请求帝王玺能够经过。真宗言听计从，还顺便将邢昺带回汴梁，任为礼部尚书。

大中祥符三年（公元1010年），79岁的邢昺患病。真宗下诏令太医诊视。六月，真宗亲自来到邢昺府邸问候，还赏赐名药一袋、白金器千两、缗彩千匹。按照旧例，北宋如果不是宗戚将相，没有皇帝亲临问候的先例。如今对邢昺特意优待，正是真宗感念与邢昺君臣多年的深厚情分。一个月后，经学大儒邢昺去世。

邢昺年近半百入仕为儒者，却连获超拔，屡得重任，他奉命校勘经籍，注解儒学经典，为北宋初年文教作出巨大贡献。但他个人为官行事贪慕权势，结交权奸，个人形象留下难以磨灭的污点。身为道德楷模的经学大儒不免俗，使得后人扼腕叹息。

## · 相关阅读 ·

北宋建立后，统治者先后组织文臣修纂了四部大型类书。编修类书，一方面有统治者安抚降臣的考虑，也有复兴文教的期待。

四部类书，保存了宋前许多珍贵资料，可谓功德彪炳。

## 文教之盛：宋初四大类书的编纂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在北宋太宗真宗时，朝廷组织力量修纂了四部大型类书。四部类书可谓囊括古今政史、小说和诗文，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历史资料，也印证了北宋文教之盛。

宋初大型类书的集中涌现，一方面和帝王重视图书积累密不可分，另一方面也有安置地方割据政权旧臣的考量。南宋学者王明清在《挥尘录余话》中就說：“太宗太平兴国年间，原先投降的诸王先后薨逝，其原先旧臣或有怨言。太宗闻之，将他们全部召入馆阁，让他们修纂如《册府元龟》《文苑英华》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之类的群书。四部类书卷帙浩博，太宗又给他们极好待遇。这些旧臣多半老死于文字中。”

宋代编纂的类书，最著名的便是上述提及的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文苑英华》和《册府元龟》。其中除《太平广记》为五百卷外，其余三部均为一千卷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

提要》称之为“宋朝四大书”。其中《太平御览》采经史百家言，《册府元龟》录历代君臣事，《文苑英华》辑录诗词文章，《太平广记》较为奇特，它专收文纪纪实小说。

太平兴国二年（公元977年），宋太宗诏编前代类书“门类纷杂，失其伦次”，就下诏编纂修书。太宗令南唐降臣翰林学士李昉为首，组织十几位大臣入馆阁潜心修撰。太平兴国八年（公元983年）十二月，该类书编纂完成，书名原定为《太平总类》。但在完成前一个月，太宗每日听政闲暇，即御览该书三卷。如果遇事没读完，无论寒冬酷暑都要补齐卷数。最终，太宗用一年时间阅完，因而改书名为《太平御览》。

全书分五十五部，部之下再有类，共计五千三百六十三类。每类之中，依据时代先后，广采经史子集各类古籍资料。据卷首所附《经史图书纲目》，类书所引图书总数有一千六百九十种。但1959年马念祖在《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》序言和凡例核实，《太平御览》所引书目数字为二千五百九十七种。类书

所辑录资料，多首尾完整，并注明出处。所引用的古籍，如今十之七八已亡佚。《太平御览》是现存类书中，保存五代以前文献最多的一部，是后人辑录佚书的宝库。清嘉道年间学者马国翰的《玉函山房佚书》中部分，就是从《太平御览》中抄录所得。

《太平御览》体例同前，宋太宗不满足于仅辑存经史百家的材料。他于太平兴国二年（公元977年）又命李昉主持编修《太平广记》，从野史小说中吸取能够“鉴照古今”的部分。太平兴国三年（公元978年），《太平广记》编修完成，三年后雕版印刷。

《太平广记》收录汉代至宋初野史、传记和小说故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其为“小说家之渊海”。书分神仙类、女仙类、鬼类、妖怪类和报应类，所辑故事，多半是谈神仙鬼怪、因果报应。《太平广记》为后世编写戏曲、小说故事提供了大量素材。南宋时善于“说话”的艺人，从小都博学《太平广记》。宋元明清人所写话本、杂剧、小说，素材也多

取自该书。清人评其书“虽多谈鬼神怪，而采摭繁富，名物典故多错出其间，词章家恒所不取，考证家亦多取资。又唐以前书，世所未有者，断简残编，尚间存其什一，尤足贵也”。

《太平御览》编纂工作接近完成时，爱书痴书的宋太宗又觉得“诸家文集其数至繁，各擅所长，兼荒其间”，又于太平兴国七年（公元982年），决定继南梁昭明太子《文选》后，续修文学总集。雍熙四年（公元987年），历时五年编纂的《文苑英华》完成。

《文苑英华》既是类书，也是一本诗文总集。《文选》所选文止于南梁初年，而《文苑英华》则起自梁末至唐，采录历代各家二千二百余人，诗文二万三千余篇。其中绝大多数为唐人著作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赞其“实为著作之渊海”。

六朝及唐人文集，十之八九已经失传，后人对文集的辑佚工作，主要依靠《文苑英华》。明代编《古诗记》，清代编《全唐诗》《全唐文》，严可均辑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

六朝文》，资料来源皆取材于《文苑英华》。《四库全书》所收录的李邕、李华和李商隐诗集，便是从《文苑英华》中辑录而出的。

《文苑英华》还保存着大量的诂语、书判、表疏和碑志等原始材料，足能补充史传缺漏，考订史籍得失。

《册府元龟》一书，则以集历代名臣事迹、治乱兴衰为主。是一部史料类的巨著。宋太宗时，就有意编修此书。但因为此前三部类书工程浩大，文人官员已无暇旁顾，到宋真宗景德二年（公元1005年），才开始修撰。至大中祥符六年（公元1013年），《册府元龟》终于编纂完成。

编书之始，书名初定为《历代君臣事迹》，书成之时则由宋真宗亲自定名为《册府元龟》。元龟即大龟，上古时代中国古人用龟甲来占卜未来，预测吉凶。《册府元龟》书名之意，即指其内容可作君臣鉴戒。此书因为是为帝王提供理政镜鉴，真宗决定选历代“君臣善迹，帮家美政，礼乐严格，法命宽猛，官师议论，多士名行”。所以该书取材极严格，只限于“正经”“正史”和部分子史中提及的君臣事迹，凡小说、杂书、天时节序、动植物等一概不收。

《册府元龟》几乎囊括了北宋以前的全部史料，其中又以记述唐五代之事尤为详实。清道光年间，刘文淇等人就曾使用《册府元龟》，对《旧唐书》进行校勘，进而写成《旧唐书校勘记》。解放后，中华书局点校《宋书》《南齐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魏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和《隋书》，都曾利用《册府元龟》进行勘校，订正了史书中的许多谬误。